



壬辰战争陈璘“击杀石曼子”事迹及其传播考辨

吴如功

(黑龙江大学黑龙江流域文明研究中心, 黑龙江哈尔滨 150080)

摘要:陈璘作为壬辰御倭战争中明军主要指挥官之一,其在朝鲜立下的赫赫战功彪炳青史,已有公论。但陈璘事迹在时人记载和后世史书的传抄中也出现了个别失实现象,万历二十六年十一月爆发的露梁海战期间“铄死大倭将石曼子”这一事迹就是其中一例。本文试分析陈璘在壬辰战争期间同岛津义弘(石曼子)交战之史实及明清史书中对陈璘“歼石曼子”一事的传播与演绎过程,对陈璘将军在这一时期的军事活动进行考辨,以求史实上的去伪存真。

关键词:壬辰战争;陈璘;岛津义弘

中图分类号:K24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70X(2016)12-0059-05

PDF 获取:<http://sxxqsfxy.ijournal.cn/ch/index.aspx>

doi:10.11995/j.issn.2095-770X.2016.12.015

Identification and Spread of Chen Lin Killed Shimazu Yoshihiro during the Imjin war

WU Ru-gong

(Center of Heilongjiang River Basin Civilization Studies,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As the main leader of the Imjin war, Chen Lin gets the resplendent battle achievement, which has no any arguments. However, something is wrong during spreading and writing about Chen Lin, for example Chen Lin killed Shi Manzi in the Imjin war. This paper tries to relate the facts what happened between Chen Lin and Shimazu Yoshihiro, and analyzes the spread of that in the books of Qing and Ming Dynasty.

Key words: Imjin war; Chen Lin; Shimazu Yoshihiro

万历二十六年(1598)十一月十九日,以中朝联军大胜告终的露梁海战为长达七年之久的壬辰援朝战争画下了一个悲壮的句号。此役中朝联合水师投入了2.6万余人,近800艘战船,伏击自泗州接应侵略日军主力小西行长军团归国的岛津义弘水军近500艘战舰,经过血战,歼灭日军大部,至此日军主力基本撤出朝鲜半岛,残余日军经锦山、乙山战斗也陆续被消灭,朝鲜半岛至此迎来了久违的和平。

作为露梁海战中明朝水师的指挥官,以御倭总兵官身份入朝参战的陈璘是这次战役胜利的最大功臣。他与朝鲜名将李舜臣通力合作,利用露梁海域独特的地形条件,集中中朝水师优势兵力,以雷霆万钧之势突袭岛津水军使其大败,并且粉碎了小西行

长军团全身而退的美梦。在海战中陈璘不顾自身安危,亲自率船救援被日军围攻的李舜臣,陈璘子陈九经为保护陈璘身负重伤,虽然李舜臣及明朝老将邓子龙先后壮烈牺牲,但联军最终击溃以萨摩精兵为主的岛津水军,日军指挥官岛津义弘至此遭到了其在朝鲜战场上最惨痛的一次失败,而陈璘也因露梁海战,被后世史家评价为“以论功,璘为首”,^{[1]卷321,陈璘传}奠定了在中国乃至世界海战史上浓墨重彩的地位。

然而在露梁海战中,陈璘是否如同部分史料所描述的那样,将当时被称为“石曼子”的岛津义弘击杀呢?“击杀石曼子”这一事迹,又是在怎样的传播中,影响到包括《明实录》在内一批重要史料的记载?

因此,陈璘与“击杀石曼子”事迹在明清两代的传播,具有其特殊的考证价值。

一、“击杀石曼子”事迹的产生

“陈璘击杀倭将石曼子”这一说法最初来自于邢玠所进呈的塘报。邢玠以兵部尚书衔总督蓟、辽、保定军务,是壬辰御倭战争后期的实际总指挥,在战斗结束后第一时间向明王朝决策中枢汇报了露梁海战大捷的消息。时任东阁大学士的沈一贯在其十二月初五日进呈的《报东三路捷请发犒赏揭帖》中记载:“题昨得总督邢玠塘报……十八日攻打行长巢窟,奇兵由西北海口以草包土填挖登城,内外夹攻,倭奴望海奔走,杀伤无算。水路总兵陈璘因石曼子来援,与之酣战,行长因得脱逃,石曼子烧死等因。”^{[2]卷4}由于塘报内容较为简洁,仅称岛津义弘在水战中被烧死,因而当时在朝臣中并未引起极大反响。

而随后邢玠与同僚经理朝鲜军务都察院右金都御史万世德联名上奏《献俘疏》,详细陈述了“陈璘击杀石曼子”一事的判定经过。邢玠在奏疏中称,他在十一月十九日战斗结束后接到陈璘塘报,称“生擒倭将、活倭及斩获倭级”,随后根据被俘虏的日军将领“平正成”和“平秀政”二人的供词,可以判定在十九日黎明“石曼子(乘)金顶楼船扑向陈总兵船,被天兵战船分围放火焚烧,石曼子被斩”。^{[3]卷6}二人同时供述了萨摩岛津家的若干基本情况,随即被带往全州亲验斩获的疑似岛津义弘首级,二人见到首级后“哭而罗跪,又讨牛而祭拜”,^{[3]卷6}并且又称“石曼子即沈安道,又名义宏”。^{[3]卷6}为了保险起见,邢玠多次验证首级真伪,并且派遣曾身陷日军军营中“能识众倭者”一同辨认,最终确定首级即为岛津义弘本人,并具表上报。

至此,明神宗遂下令将首级及“平正成”与“平秀政”二人及其他被俘倭酋等六十一人递解至京,献俘后明正典刑。陈璘也因为露梁海战大胜及“击杀石曼子”这一巨大战果而在之后的论功行赏中得到“总兵陈璘以舟师歼倭功最”^{[4]卷339,万历二十七年九月乙卯条}的评价,进而受到了进都督同知,世荫指挥僉事的封赏。

由于受到邢玠的奏疏影响,陈璘“击杀石曼子”的功勋在万历时代受到了相当程度的关注和肯定。与陈璘同一时代,后出任内阁首辅的叶向高在邢玠去世后所做的《昆田邢公墓志铭》中就写到“……石曼子率诸兵来援,公授方略,陈璘邀击锦山南海间,大破之,石曼子歼焉。禽伪九州都督平正成及大将平秀政等,先后斩首五千级,焚其舟九百,倭赴海死者无算。”^{[5]卷11}而在万历中期任礼部尚书的冯琦在其赠与邢玠的《贺大司马邢公平倭奏凯序》中也写到

“石曼子率诸路倭来援,公授诸将方略,邀击,大破之,石曼子歼焉。”^{[6]卷12}这种肯定虽然以对决策者邢玠的恭维表现出来,但归根到底是对援朝水师及其直接指挥者陈璘赫赫战功的赞扬。加之在壬辰御倭战争结束后,陈璘很快率军投入了平定播州土司杨应龙叛乱的战事中,时人对其多有美誉,“击杀石曼子”一事也在朝野传播中如以上说法一样,成为了陈璘的一大功勋。

然而在当时的决策层角度,以邢玠所进塘报及《献俘疏》作为陈璘“击杀石曼子”说法的来源核心,可以发现若干疑点:

首先,“平正成”和“平秀政”二人身份不明,供词存在严重谬误。按《献俘疏》中的描述,提审时认定平正成为“二十七岁,萨摩州人,平秀义之子,义弘族侄”;而平秀政为“称系萨摩守,本名花压石,又名大石马,年四十岁,为义弘下大将”。两人均为“年食米两千包”的中高级武士。然而岛津部下并未有或食禄两千石、或曾任萨摩守、或正名或别名为“秀政”或“正成”的相似武士。结合到明朝时称丰臣秀吉为“日本关白平秀吉”,可以说在审问时负责官员就将二人的具体名字习惯性地辨认错失了。而在岛津家族的成员关系上,二人称岛津四兄弟(义久、义弘、岁久、家久)中“三石曼子赛门,在家病死;四石曼子那贺贷贺撒见在萨摩州,不管事”。然而岛津义弘的三弟岛津岁久在日本天正二十年(1592年)因卷入反对丰臣秀吉侵朝而爆发的“梅北一揆”而被迫自杀;四弟岛津家久早在日本天正十五年(1587年)岛津家降服于丰臣秀吉的“九州讨伐”之后就因急病去世,可见二人对岛津家虽有一定了解,但了解程度远远达不到他们自称的亲密关系。而在两人指认岛津义弘首级后,又被命令指认其他二十三颗首级,二人表示“俱是上官好将,情亦真确”。然而虽然岛津军团在露梁海战中损失惨重,近万精锐几乎全军覆没,但并未有大名级将领阵亡,也没有具有名号的中高级武士阵亡。而且最后这二十三颗首级也未提供详细名号,仅凭二人的感情流露难以断定这些人的身份,自然也不能断定先前的首级系岛津义弘本人了。

而两人之所以谎报身份,其根源来自于邢玠对其采取善待政策,以达到从其口中套取情报的目的。邢玠在提交兵部的塘报中提到“前露梁洋之战生擒倭将一名,诡称石曼子部下,兹译审系关白心腹大总帅平正成,乞改正以彰示四夷,从之。”^{[4]卷330,万历二十七年正月戊子条}而在“平正成”指认首级后,又给予其祭品允许其祭祀。在这种优待下,二人或为了求生而编造身份,并信口开河指认首级与提供供述。这种谎报身份又引起了邢玠等明朝官员的

进一步误判，以至于最后在明朝史籍中，“平正成”的身份已经演变成子虚乌有的“伪九州提督”。^{[5]卷11}

其次，“石曼子”之死存在相互矛盾的说法。陈璘在塘报中仅称呈送抓捕的日军俘虏和斩获的首级，并未自称“击杀石曼子”。而在前文中邢玠塘报先称岛津义弘“烧死”，后在“平正成”和“平秀政”二人口供和无名首级的基础上，称其“被斩”，而在后来提交兵部的来往奏疏中，又称“铕死倭将石曼子，斩获其首级”，^{[3]卷6}先后说法不一。况且在海战中，抓捕俘虏与斩获完整首级记功并非容易之事，露梁海战中完整斩获之日军首级仅为三百余颗，而最后被献俘处决之六十一人中，“平秀政以下五十四人系擒之阵上者，要时罗以下七人系各倭差来讲事者”，^{[4]卷三百七十一，万历三十年四月癸卯条}根据《献俘疏》中对六十一人被俘经过的记载，可知这些人也并非全部都是露梁海战中被俘虏的，因而“石曼子”之死同时满足获取首级与存在辨识首级者两个条件，并非易事。

“击杀石曼子”一事真正水落石出，则要等到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岛津义弘奉命送回明朝海贼与被虏军民一事。邢玠在其《题倭奴送回宣谕人役疏》中记录了此事。称先前受到万世德派遣，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出使日本的毛国科在本年四月十八日在宁波返回。据毛国科称，十一月初一其与同僚进入泗川倭营，后二十七日跟随日军撤军回日。后在伏见城会见德川家康，除讨论诸机密事项外，提出讨伐各岛海寇及送还被虏军民的要求。日方因此诛杀了各岛海盗，“其前后杀过贼犯共计一百余徒，今将贼首李明等一十一人肘绑送来，与科带回正罪”，同时岛津义弘因为考虑到“贼党众多，难免中途截夺，因差倭官喜右卫门带领兵役一十二人擎彼国旗号沿途护送前来”。^{[3]卷6}在邢玠的上疏中，提到岛津义弘时并不提到其为“石曼子”或其与岛津家的关系，仅称其为“萨摩岛主义弘”或“义宏”，这证明邢玠也许在此时意识到了“石曼子”未死于露梁海战，而试图避免提及岛津名号。但由于毛国科使日事件激发了丁应泰、徐观澜等与邢玠、万世德之间关于壬辰战争晚期对日和谈试探的争端，以及明朝内阁决策层在这一问题上的暗潮汹涌，引发了朝堂内外一系列的相互攻击。直到万历三十年，吏部给事中曹于汴专门提到岛津义弘未死，并以此攻击邢玠在壬辰战争中的指挥决策。他认为“即奏称倭将义弘斩级矣，倭将正成生擒矣，然义弘、正成见在无恙，复以书来申明和约，原情俱露，夷患方深。则当时死于兵戮于西市者，何人也？此古今未有之欺”，^{[7]卷19，纠邪类}这篇奏疏试图彻底否定邢玠的功绩，然而却未受到明神宗的重视。明神宗早在献俘仪式结束后，以平朝

鲜功加邢玠太子太保衔，并在随后的近十年中始终信任重用邢玠，而随着万历三十九年邢玠以南京兵部尚书一职致仕，并于万历四十年去世，此事的主要经办人也就此凋零了。仅留下若干自相矛盾的记载保存在不同的时人文集与朝廷奏议之中，为这一传说的传播留下了伏笔。

二、“击杀石曼子”事迹在明代史籍的传播

随着时间的推移，壬辰战争的决策者与亲历者日益凋零。他们生前就自相矛盾的记载，为“击杀石曼子”一事在随后的史书传播中越发扑朔迷离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果说在万历时期成书的《明政统宗》在谈到露梁海战时还仅称“倭兵披靡，擒倭将秀政，杀捕倭兵三百有余，溺死者无算”，^{[8]附卷}不提石曼子之死的话，那么在天启——崇祯时期，这一事迹的传播就愈发混乱了。

查考天启——崇祯时期明人对陈璘与岛津义弘相关军事活动的记载，关注点多在因意外导致明军先胜后败的岛山之战和露梁海战“击杀石曼子”两点。其中泗川之战的记载和史实基本吻合，如万历二十九年进士，与露梁海战决策与作战人员略有交往的茅瑞征在其《万历三大征考》中就岛山之战前岛津军的实力评价道“中路则石曼子据泗川，北恃晋江，南通大海，为东西声援。萨摩州兵剽悍，称劲敌”，^[9]但在谈到“击杀石曼子”一事时，却仅称“陈将军璘统苍唬船追击，并焚死石曼子，得级三百二十四，水为赤。”^[9]由于茅瑞征曾任兵部职方司主事，结合其《万历三大征考》的写作过程以及仅在邢玠奏章中提及的陈璘“苍唬船”，岛津义弘“焚死”的细节，可以认定茅瑞征在记叙露梁海战时，主要依靠的是邢玠在露梁海战结束后进呈较早的若干奏章。而由于《万历三大征考》成书于天启元年，可以说他在书中的相关说法影响到了天启和崇祯朝一批记载壬辰战争相关内容的著作。

如成书于天启中期的《国朝武功纪胜通考》记载为“石曼子引舟师救行长，遇璘半洋邀战，行长乘小艇逸，焚死石曼子，水为赤”；^{[10]卷8}徐象梅《两浙名贤录》在记叙沈一贯事迹时称“(与)舟师陈璘夹击，斩石曼子，搜余党在诸岛者尽歼之”。^{[11]卷14，辅弼}而于崇祯年间出现的一批史籍则强化了这种说法，如曾任南京兵部侍郎的岳元声在补订《皇明通纪集要》时完全使用了《万历三大征考》的说法，而且将斩获首级数目三百二十四错录为“得级二百二十四”；^{[12]卷38}徐昌治《昭代芳馨》也错将斩获首级数目录为“得级二百二十四”；^{[13]卷30}沈国元《皇明从信录》在传抄中也出现了这一错误。这证明“击杀石曼子”一事在传抄

中出现的以讹传讹现象分外严重,而由于明代中后期出版业日益发达,文网松弛,知识分子著书立说欲望强烈,没有能力接触奏议档案的基层知识分子在自己的著作中辗转抄录他人内容所造成的史籍创作的同质化现象,也为这一说法的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同样,由于前后矛盾的奏章和一系列事件致使明朝官方对这一细节不暇比对,以至于在漫长的《神宗实录》编撰中正式将“击杀石曼子”一事记入其中。即“总兵陈璘即身先将士鼓众大战,铕死大倭将石曼子,又生擒一部将,其焚溺死者无算,虽水中不能割级,而犹斩获三百余颗。”^[4]卷329,万历二十六年十二月丙寅条 这一说法完全以邢玠十二月期间进呈的奏章为叙事来源,隐去了这一细节背后的争端,其影响到明末及清代的一系列相关史籍。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阶段,同样存在着对这种说法不予置信的声音。茅元仪在其《武备志》中全篇称岛津义弘为“义弘”,而不称其为“石曼子”;在详细记录了露梁水战前后陈璘水师的奋战、岛津义弘与加藤清正的矛盾等事之后,认为露梁海战始末应为“我兵战益力,倭不善水战,且无斗志,遂大败。复窜于岸者为陆兵所掩,溺死万余,斩首尚千余级”,^[14]卷二百三十九,占度载度 在其《石民四十集》中亦持此说法。茅元仪很可能注意到了“击杀石曼子”一事前后的错讹,因此将这一夸张的战果略去不计。

此外邢玠在毛国器使日事件之后所进奏疏中所称“义宏”,也可能是误导茅瑞征之后一批史籍编撰者的一个因素。《万历三大征考》在书写壬辰战争结束后日本爆发的“关原合战”始末时,曾突兀的提到了“秀赖因娶家康孙女,而萨摩州兵最劲,太守平义弘稍与颀颀,及家康老,两酋几不相下。”^[9]其中的“平义弘”与之前行文中的“石曼子”俨然成为并列的两个人物,而茅瑞征随后在其《皇明象胥录》中又提及“(德川家康)与萨摩州太守平义弘抗不相下”,^[15]卷2 这种误判直接影响到了《皇明通纪集要》、《皇明从信录》以及相较成书最晚的《昭代武功编》的相关记载。而范景文所做《昭代武功编》综合了上述诸说法融于同一文本中,基本上在崇祯末期形成了完整的“击杀石曼子”叙事。

三、“击杀石曼子”事迹在清代史籍的传播

在清代官修及民间私自编纂的明史史籍中,“击杀石曼子”事迹并未出现进一步演绎。这是由于清初修纂完成的史籍由于其作者尚可接触到明末相关史料,基本全盘继承了其史料源头的说法;而由于文字狱兴起,一大批记叙“万历三大征”等明末史事的

史籍又在“寓征于禁”方针下被禁毁,以及官修《明史》的完成,此后出现了百余年的专著空白期,直到清代晚期,出现接触日本一手史料的学者与专著,“击杀石曼子”事迹在史籍中的存伪才正式盖棺定论。

如在清初主要史籍中,《罪惟录》继承《皇明通纪》之说法,称“陈璘追行长,焚其酋石曼子,得级二百四十有奇”;^[16]帝记,卷十四 而《明史纪事本末》则继承范景文《昭代武功编》之说法亦称“陈璘统苍唬船邀击之,得级二百二十四”;^[17]卷六十二,援朝鲜 张岱《石匱书》也持以上看法。然而钦定《明史》中所提及“击杀石曼子”事迹的三篇传记中,却各有详略。如《刘綎传》仅称“石曼子引舟师来救,遇陈璘海中邀击”;而《陈璘传》称“十一月石曼子引兵西援行长,璘邀之半洋击败之,曼子死,歼其徒三百余”;《董一元传》则称“会关白死,倭遁,石曼子为陈璘所歼”。^[1]卷323、239、247 三传作者很可能史料来源截然不同,《陈璘传》中的说法基本符合壬辰战争后期来往奏疏中的提法,因而《陈璘传》的书写也最接近于史料源头。

而在乾隆朝后百余年的长久沉寂后,黄遵宪《日本国志》的问世为“击杀石曼子”事迹打开了新局面。在1871年《中日修好条规》签订后,黄遵宪作为首任驻日参赞就职于日本,在日五年多期间他深感日本在明治维新后新旧激荡的大时代中迎来的变革,因而搜罗了大量日本史书,着手完成了近50万字的《日本国志》。在书中黄遵宪根据日方资料,认为“十一月清正、义宏各收兵入海,刘綎追围行长,清正与义宏返击,拔行长俱上舟。陈璘以舟师邀击之,互战各有胜败,卒脱归”,^[18]卷5,邻交志上 并且随即记载了岛津义弘奉命送还海盗与被虏军民等事。这一说法随后影响到了王先谦《日本源流考》一书,遂有盖棺定论之议。至此“击杀石曼子”一事在中日两国史料比对之下,最终完成了辨伪。这一段悬案也在传播与传播中,成为了史料转录中的一个典型案例。

四、结语

陈璘“击杀石曼子”事迹的产生与传播,不同于民间传说对英雄的文学性美化。它的出现既源自明末决策层政治斗争的主观故意,也受到战局混乱一时难以清楚鉴别战果的客观条件制约。经过明末一批史家的转叙和《明实录》、《明史》等一批具有很高史学价值的典籍记载,最终“假亦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时至今日还在影响着一批关注壬辰战争及陈璘生平事迹的研究者及其专著,如尚有错讹称石曼子为“石田三成”者;有称陈璘在水战中“生俘

(下转第67页)

自于实战经验,讲究实际,不按部就班,战场瞬息万变,陈璘能够审时度势,故其能够抓住有利战机,屡战屡胜。

2. 亲自督军,勉励将士。当陈璘所属与敌军陷入僵局之中,陈璘往往会亲自督战,为将士打气,这些状况并不少见。平播之时,陈璘已年近七旬,这于一名老年将领而言,实属不易。

3. 善用火器、死士。通过史料不难发现,陈璘在平播过程中大量使用火器与死士。如上文所叙,陈璘曾于神机营供职,故其对于火器威力相当了解;且明代火器本身使用就甚为广泛,在此出现不足为奇。死士也就是突击队,这是陈璘战术中之一把尖刀,在战局打不开局面之时,陈璘往往能够利用死士打开一条出路。

4. 攻、抚结合,注重实效。陈璘并非遇敌军便打,其人非常注重实际效果,是一名实用主义者;他不拘泥于某一方法,只要能够获得胜利即用之,故陈璘征战途中多次出现先攻之后抚之的状况。

纵观陈璘之一生,他出身于平凡家庭,无特殊背景,但“少怀大志,习武术,谈韬略,结交豪贤”^[13],以白身投于军,通过努力由最初一名普通兵士成长为最终统领一省之总兵,并利用自身之才略在国家抵御外敌入侵,平定内乱中发挥极为重要作用。尤其于平播之役中,他统领偏桥一路兵士,过关斩将,多次使处于被动状态中之明军得以扭转战局,最终彻

底平定播州杨应龙之乱,其为民族与国家做出之卓越贡献必将永远彪炳史策,为人所颂。

[注 释]

- ① 石曼子,真名岛津义宏,经黄遵宪考订其并未于此海战中被杀,郑海麟. 黄遵宪传[M]. 北京:中华书局,2006,P287.
- ② 此处《明史》卷312,列传第200记载为“二十四大罪”与《明实录》卷230,万历十八年十二月癸未条相异,亦有学者用《明史》之载。

[参考文献]

- [1] 陈芳斌. 陈璘史实与传说[M].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
- [2] 张廷玉. 明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 [3] 明穆宗实录[M]. 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 [4] 明神宗实录[M]. 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 [5] 王圻. 续文献通考[M]. 万历三十年松江府刻本.
- [6] 李化龙. 平播全书[M]. 明万历刻本.
- [7] 陈季君,党会先,陈旭. 播州土司史[M].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5.
- [8] 诸葛元声. 两朝平攘录[M]. 万历三十四年刻本.

[责任编辑 李兆平]

(上接第62页)

石曼子者”;亦有称“石曼子当场被陈璘击毙”者。这种错讹,固然来源于对于史料的盲信,同样也十分值得后学者引以为戒。

然而,陈璘将军身为在壬辰战场上立下彪炳军功的一代名将,其率领的明朝水师所取得的赫赫战果,足以青史留名。而其生平之辨伪存真,正是史学研究之意义。“击杀石曼子”事迹的出现与传播,正是现代陈璘研究者需要倍加留心的一处误区,同时也是陈璘研究中余韵尚存的一段插曲。

[参考文献]

- [1] 张廷玉. 明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 [2] 沈一贯. 敬事草[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 [3] 邢玠. 经略御倭奏议[M]. 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出版社,2004.
- [4] 明神宗实录[M]. 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

究所”,1962.

- [5] 叶向高. 苍霞续草[M]. 明万历刻本.
- [6] 冯琦. 宗伯集[M]. 明万历刻本.
- [7] 吴亮. 万历疏钞[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 [8] 涂山. 明政统宗[M]. 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1985.
- [9] 茅瑞征. 万历三大征考[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 [10] 颜季亨. 国朝武功纪胜通考[M]. 明天启刻本.
- [11] 徐象梅. 两浙名贤录[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
- [12] 陈建. 皇明通纪集要[M]. 明崇祯刻本.
- [13] 徐昌治. 昭代芳馨[M]. 崇祯九年徐氏知问斋刻本.
- [14] 茅元仪. 武备志[M]. 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
- [15] 茅瑞征. 皇明象胥录[M]. 台北:台湾华文书局,1968.
- [16] 查继佐. 罪惟录[M].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
- [17] 谷应泰. 明史纪事本末[M]. 北京:中华书局,1985.
- [18] 黄遵宪. 日本国志[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 李兆平]